

中美俄日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刘建飞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要] 冷战结束后,中美俄日四国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合作是四边关系的主流。在经济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地区安全领域,四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广泛、深入。而且,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来越严重,四国在这些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具有战略性。然而,在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领域,美日和中俄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对抗性,战略互信难以建立,冷战格局的影子时隐时现。四国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维持“冷和平”状态。

[关键词] 大国关系;东北亚安全;冷战后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6-0001-08

中美俄日四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战略力量,都是“一超多强”的成员。历史上,这四个国家的相互关系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冷战结束后,与国际关系总体变化相适应,四国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展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俄罗斯经济的复兴,日本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美俄日关系越来越受人们关注。四国关系的走向,关系到世界和平以及政治格局变化,更影响到东北亚的安全。

要给冷战后的中美俄日关系进行定位,不能再沿用冷战时期以及此前的单线或平面思维方式,将国家间的关系看成是“非敌即友”的关系。冷战后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简单地用敌人或朋友已不能准确描述它们。对中美俄日关系,应当从多维视野来考察。就目前四国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最起码应该有安全、经济、政治

三个领域,而安全又应该包括传统的军事安全、地区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三个方面。只有从多维的视角下考察,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四国关系的走势及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

一、合作是大国关系的主流

冷战后的中美俄日关系与世界总体局势密切相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化、多极化、非极化、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中美俄日之间的关系。各国从自己的大战略目标出发,都不愿意同任何另一方走向冷战对抗,都希望同对方进行各个领域的合作,成为伙伴。就是在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对立双方也都寻求和平地竞争和较量,避免导致双方关系的总体对抗。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合作。正是因为这样,冷战后,

中美、中日、中俄、美俄之间都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就是俄日之间，也在不断加强交往与合作。

四国关系能够避免对抗，并形成合作为主的“伙伴关系”，首先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关。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制定了“参与与扩展战略”，以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为具体目标，维持、巩固、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从三个目标出发，俄罗斯和中国既有与美国利益冲突的地方，也有很多共同利益。就共同利益来说，在经济方面，美国要扩展经济，需要拓展海外市场，而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新兴大市场。在推进民主上，美国认为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但要在中国推进民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同中国接触，通过交往、接触影响中国，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对俄罗斯也是这样，推进俄罗斯民主的最佳途径也是与之交往、接触。在地区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美国也需要中俄的合作。“9·11”后，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首要任务，与之紧密相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整治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排在优先位置。在这个战略框架下，美国更趋向于寻求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中俄都是在当今国际事务中有影响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核大国，没有中俄的合作，美国是不可能顺利实现反恐防护和整治极端伊斯兰这些要务的。面对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美国虽然试图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但是有些力不从心。2011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虽然强调“一些国家正在开发‘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和战略，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行动自由”，并且将“慑止和击败侵略”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目标，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但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而中国和俄罗斯都美国寻求合作的对象。^[1]2011年中东北非政局动荡，极有可能使大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美国更难以尽快从该地区脱身，因此将主要战略矛头对准中国或俄罗斯在近期内很难成为现实。

冷战后的俄罗斯，经济一度衰落。经过几年的摸索，俄罗斯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富民强国，具体讲就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争保持7%—10%的经济增长率，到2010年时，使俄成为欧洲第二或第三经济强国。为了实现这个发展战略，俄确立了兼顾东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美国、中国和日本在这个战略中都占有突出的位置。虽然受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油价下跌的冲击，俄罗斯经济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这种挫折是暂时的。俄罗斯只要坚持既定发展战略，就需要同美中日这三个全球排前三位的经济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冷战后的日本，经济虽然一度低迷不振，但其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却未受动摇。与此同时，日本致力于实现政治崛起，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日本虽然将日美同盟放在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上，但发展对华、对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是日本最大的邻国，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同中国发展关系，都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俄罗斯也是日本的重要邻国，而且拥有丰富的能源，而日本则是能源短缺的国家，发展对俄关系也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营造稳定、安全、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首先要同美、俄、日这三个大国搞好关系，因为它们是当今世界对国际安全和中国周边环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此外，从经济发展本身来讲，美日都是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俄罗斯是个能源大国，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也有望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

从四国的大战略看，各国都有发展相互关系的动力，而且四国也确实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四国在诸多领域都是合作伙伴。

在经济方面，中美日俄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共同利益，中美、中日、中俄、美俄、日俄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是合作伙伴。而且，四国的大战略都把经济放在很突出的位置上。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中美俄日在反恐防扩等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是合作伙伴。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朝核六方会谈。在六方会谈中，中美俄日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这些大目标上是一致的。六方会谈开启了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先河，也表明中美俄日之间确实存在着能够让它们坐到一起，寻求合作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可以超越地缘战略上的竞争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此外，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中美俄日之间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四国在“二十国集团”的框架内进行了广泛合作。

在地区安全方面，中美俄日在朝鲜半岛诸问题上一直在进行合作，是合作伙伴。朝鲜半岛既存在着核问题，又有南北关系问题，这些都会危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甚至会影响到大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在陈水扁当政时期在抑制台独冒险，维护台海地区安全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许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日本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也一再表态不支持民进党政府的台独冒险活动。

从上述两个领域三个方面来看，中美俄日是伙伴关系，而且这几个方面都涉及到三国的长远利益和核心利益，因此，这种伙伴关系也具有战略性。然而，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中俄与美日之间的关系却受到两个因素的严重制约，即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二、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影响下的军事安全关系

在近现代历史上，四国的军事安全关系错综复杂，敌友易位频繁。美俄日都曾是侵略、欺压

中国的列强，都通过一系列不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当然，三个列强之间也有竞争。日俄战争期间，美国暗中支持日本；十月革命后，美日都参加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美日矛盾逐渐加剧，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太平洋战争期间，美中苏三国携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战后，美苏走向冷战，美日则成为盟友。新中国成立后，先是与苏联结盟，站到美日的对立面；以后中苏分裂，中国与美苏日同时对抗；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日又结成一条线，共同对付苏联。

冷战后，大国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已经没有截然的敌我对抗关系，四国之间除了美日仍然维持同盟关系外，其他双边之间都建立起了伙伴关系。然而，大国关系中固有的竞争性和安全困境并未消除，有时还会激化。这一点在2010年东北亚局势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韩国天安舰号事件、中日钓鱼岛冲突、俄日北方四岛之争等一系列事件中，中俄为一方、美日为另一方的对立状态清晰可见。天安舰号事件发生后，美日毫不迟疑地支持韩国的立场，与中俄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在中日、俄日领土纠纷中，美国力挺日本，不怕得罪中俄；而《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的发表，则表明中俄两国在涉日领土问题上要相互支持。而此前，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并不是站在俄罗斯一边。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至今仍然在四个岛屿的名字后面用括号注上“俄占”，并且在媒体上仍然称“北方四岛”，而不是用俄罗斯的说法“南千岛群岛”。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蜜月之时，中国曾公开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

中俄与美日之间在军事安全上这种具对立性质局面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美日，尤其是美国。由于美国和日本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将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军事同盟进一步强化，并且强调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其矛头所指，虽不明言，但几乎所有地球人都心知肚明。美日将中俄这两个非盟友而又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国

视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必然会引起中俄两国做出相应的反应。于是在传统的军事安全上，以美日为一方，中俄为另一方面，形成某种准对抗的关系。中俄虽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但两国签有《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在涉及领土主权的台湾、西藏、车臣等问题以及全球战略平衡的美日导弹防御体系等问题上，中俄的立场比较接近，并与美日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对立。在对待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上，中俄也经常协调一致，比如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日本则对美国亦步亦趋。2011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中俄都投了弃权票，而日本则同美国一道投了赞成票。四国关系状况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东北亚冷战格局有相似之处。

决定四国关系状况的关键角色是美国。冷战后，美国确立霸权战略，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从苏联解体到2015年，是一个“战略间歇期”，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但此后则有可能出现对美国地位构成严峻挑战的全球性对手。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只有那些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战略对手”才能真正挑战美国的一超地位，对美国的生存构成威胁，是心腹大患，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只不过是皮介之疾，不会动摇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天美国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并被期望在1997-2015年间维持现状。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2] (P.270-271)} 美国应当对此早做准备，阻止这样的国家崛起。在这些战略家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的《1996年战略评估》就提出，美国要担当全球的领导，为此一方面必须巩固和加强北美、欧洲和东亚的发达国家民主同盟，形成民主的和平区；另一方面“制止俄罗斯重新帝国化和中国的扩张主义”。^{[3] (P.270-271)} 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也提到，“俄罗斯和中国被某些人看作有潜力成为这样的竞争对手，尽管她们各自的前途还不确定。”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小布什上台初期，明言中俄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与这样的全球战略相适应，美国的亚洲战略首先就是巩固美日同盟，拉住日本，遏制中俄。而日本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也乐于呼应美国的亚洲战略。日本有“与强者为伍”的对外战略传统，加强美日同盟，正是对这种传统的发扬。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同中国之间也有多重矛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或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日本选择美国是顺理成章的。四国中，日本是惟一的无核国家，而且地域狭小，缺少战略回旋空间，只有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结盟，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也严重影响着日本的对外战略。

俄罗斯独立初期，一度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战略，在军事安全上寻求同西方的全面合作，将美国与北约视为合作伙伴。不过不久，随着北约东扩，美国的抑制俄罗斯发展的战略意图逐渐明显，俄开始调整对外战略。1996年的《总统国家安全咨文》就提出，北约东扩使欧洲军事力量对比向不利于俄的方向发展。^{[4] (P.58)}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北约战略新概念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北约要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谋求对俄的绝对战略优势的意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才放弃了“一边倒”战略，转而采用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战略，积极寻求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中俄关系的发展引起了美国战略家们的不安。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中就指出：“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联盟”。^{[5] (P.72)} 不过，“9·11”事件为美俄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俄罗斯是美国战略对手的呼声在美国战略界大为减弱。然而，美国并未因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便放弃了霸权战略，而是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反恐战争来推进霸权战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意图，在前苏联地区不断策动“颜色

革命”就是明证。俄罗斯对此也十分清醒。2008年俄格战争就是俄罗斯对美国的一次反击。

总的来看，在传统的军事安全上，由于最有实力的美国将中俄作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为此要拉住日本共同防范中俄，于是形成了以美日为一方，中俄为另一方的具有对抗性质的格局。美日之间和中俄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远胜于美中、美俄、中日、俄日之间。当然，中俄之间没有同盟关系，而且俄罗斯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也心存不安，因此，中俄两国的军事安全关系远没有美日密切。

三、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关系

冷战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意识形态成为决定冷战对抗两大集团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明显减弱，但是并未消失，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仍然秉持冷战思维。

中国与美日之间，除了军事安全上的竞争关系外，还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而且有一定的对抗性。冷战后，美国一直奉行推进民主战略，将之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之一。与之相应，美国一直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耿耿于怀，并将这样的中国作为“推进民主”的重要对象。在美国看来，民主国家更倾向于接受美国这个最强大民主国家的领导地位，不易对美国产生“敌意”并威胁美国的安全；而共产主义是民主的天敌，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共产主义已成了民主的反义词”。^{[6](P.18)}所以在政治领域，中美关系远不如美俄关系。尽管俄罗斯仍然拥有足以毁灭美国的核武库，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信任度远高于对中国。还在苏联解体前（但是已经发生“质变”），美国就改变了对苏战略，将“遏制战略”改为“超越遏制战略”，其宗旨是“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

国际体系”。这种转变的根据之一就是：“苏联开始走向民主化”。^{[7](P.143、151)}这与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对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此后，美国对俄战略与对华战略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强调“中国仍然坚持全国实行共产党一党统治”。^{[8](P.433-434)}

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将中国看成“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9](P.6)}这个国家能否演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这一点在2006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达得最为明确。报告称：“当经济继续增长时，中国将面临它自己的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走东亚很多民主国家所走的道路，将更多的政治自由附着在经济自由上。”报告还将“一些政权寻求将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分割开，在追求繁荣的同时却否定其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为未来美国推进民主战略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并宣称，“我们的战略就是鼓励中国为它的人民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10](P.41-42)}也就是说，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是个战略问题，不仅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如果中国做出错误的“战略选择”，美国的对华战略也会随之改变，就会由目前的以合作、接触为主的战略转变成以竞争、遏制为主的战略。

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在指向中国的同时，也指向俄罗斯。俄罗斯在普京主政期间，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强调“主权民主”，被美国批评为“民主的倒退”。在美国看来，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至少与西方民主的标准相差甚远。梅、普共治后，美国一直怀疑这是为普京再次掌权而做的一种过渡安排，俄罗斯的民主仍然存在问题。

在民主问题上，日本虽然不像美国那样强调“推进民主”，但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安倍晋三任首相时，大有迎合美国的倾向。安倍大讲价值观外交，并且试图构建由日、美、澳、印为主体的东亚地区的“民主联盟”。实际上，作为美日同盟基础的“共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主。

安倍晋三之后的麻生太郎首相以及民主党政权的前原成司等政要也都有与安倍相同的理念，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未得以施展而已。

与传统军事安全相似，在民主问题上，也形成了以中俄为一方，美日为另一方的准对抗关系。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会强化军事安全上的竞争，因为没有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美日很难同中俄建立战略互信。不过，美日与中俄之间的这种潜在战略对手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对抗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美苏都曾将战略导弹瞄准对方，并运用几乎所有的宣传机器“妖魔化”对方，而现在无论是美俄、俄日之间，还是中美、中日之间都没有这种对抗性。

四、中美俄日关系走势及其地区影响

综合上述各个领域四边关系的状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俄日关系总体上是合作、互补性的四边关系。在四边关系中，作为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不是主要方面，因为从四国的大战略出发，四国任何一方都趋向于发展同另三方的关系，积极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甚至尽量避免对抗。

当然，中美俄日四边关系是不均衡的。美日是军事同盟，安全关系最为密切，同时又是意识形态上的“同志”；但是美日在经贸上互补性较弱，竞争性较强。中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又签有“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以从安全角度讲，中俄关系相对密切。美俄也是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有一致性；但是由于美国认定俄罗斯民主在倒退，特别是双方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和第二号军事大国，军事战略上的竞争性非常明显。中美是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从定位上不如美日、美俄与中俄关系；但是中美之间的经贸

关系远胜于美日、美俄和中俄之间，所以，就是小布什政府将中国看作“战略对手”的时候，仍然声称中美是“经济上的伙伴”。中美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是美俄与美日之间所没有的。中日之间经济关系也很密切，是合作伙伴，政治关系近些年也出现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而且双边关系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但是，中日之间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双边关系发展仍潜伏着危机。俄日关系因北方四岛领土争端的影响，一直未热和起来；但是两国在经济、能源等领域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很大。

除了双边层次的不均衡外，四边关系中还有着三边层次的不均衡。中美日在经贸、能源、环境上有很强的合作性，特别是能源上，三国都是石油进口国，利益较为一致，而与能源出口国俄罗斯的利益分歧相对大一些。在气候变化上，美日俄利益较为接近，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同三国有明显差异。在全球政治上，中俄日都寻求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这与美国的霸权战略是背道而驰的。在历史观上，中美俄（苏）都是二战的战胜国，对日本右翼否认战争历史的作法都持批评态度。与之相关，在日本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中美俄作为现有的常任理事国，利益同日本有明显区别，尽管美国口头上表示支持日本。在民主政治上，美俄日都是“民主共同体”的成员，同中国有较大的距离，尽管俄罗斯的“主权民主”遭到美国的批评，日本安倍首相试图构建的“东亚民主联盟”也未包括俄罗斯，但在美日的心目中，在民主政治上，俄罗斯与中国还是有质的区别的。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美日俄都表示担忧，在这方面，有时俄罗斯比美日还强烈。^①

四边关系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是合作性、互补性趋于继续加强，还是对抗性、竞争性趋于增大，主要取决于四国之间能否建立战略互信。

^① 2009年秋，笔者在俄罗斯参加一个有关东北亚安全的国际研讨会，与会的美国和日本学者在谈到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时，都比较隐晦地称是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俄罗斯学者则直言不讳地称是中长期内地区安全最大威胁。

就目前来看，四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有进一步发展同另外三国关系的良好愿望，客观环境也有利于四边关系的发展。

四边关系中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是中美关系。随着中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被看成是世界“第二”了，至少在美国这个“老大”心目中，中国是其最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中美之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再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美国更倾向于加大牵制、遏制、防范、平衡中国的力度。这也是 2010 年中美在南海、朝鲜半岛问题、人权、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龃龉的原因。然而，中美关系在经历了一年的振荡后，以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为标志又回到正常的轨道。这表明，美国这个“老大”虽然不喜欢出现一个“老二”，但是从现实出发，美国必须同这个“老二”合作。美国出于维护霸权这个全球战略总目标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尽其所能牵制、遏制中国的崛起，要拉拢一切能拉拢的力量平衡中国。但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根本出路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而同中国对抗不但不利于提升实力，而且还有可能使自己受伤，或实力下降。正如大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所言：“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现实是，这两个国家谁都主宰不了对方，它们之间的冲突会让两国社会均疲惫不堪。”^[1]美国不会犯当年英国所犯的那种错误：不惜一切代价打压德国，结果是虽然打倒了德国，但是自己的霸权地位也丢掉了。美国清楚：这是一个多强竞争的时代，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最终结果都是对抗双方两败俱伤，其他竞争者获渔人之利。中美关系回归正轨也表明，作为“被老二”的中国，心理更明白：崛起之路还很长，“老二”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更严峻，一定要坚持韬光养晦，走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要同美国这个“老大”继续合作，这是能否抓住、用好、甚至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具有示范性。作为意识形态对立，又是世界“老大”和“老二”的美中两国都能和

平相处，寻求合作共赢，其他大国之间又有什么理由非要走向对抗呢？实际上，当今世界，许多因素在制约大国关系走向对抗，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其中除了多极化外，作用较大的是核武器和全球化。当今时代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是核武器的存在。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就意味着核战争和核毁灭。这不仅是交战国家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如果说在前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是造成人员、财产的损失，使交战双方或一方的国家实力下降，然后还有可能通过和平重建恢复起来的话，那么在核时代，和平重建的可能性几乎无存。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有责任从各国人民的福祉、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存亡的高度出发，找出一条避免核灾难的路子来。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大国之间上演任何形式的“大国政治悲剧”，即使是不一定能带来核大战的冷战对抗，也都会是一损俱损。如果说在美苏冷战对抗之时，由于美苏双方基本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因而冷战还有胜利者的话，那么到了全球化已经将各大国都深深卷入其中的当下，大国之间的冷战对抗就很难再有真正的赢家。

从历史来看，中美俄日四国关系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只要四边关系避免总体对抗，东北亚就能够保持相对和平状态，地区安全就能够有基本的保障。2010 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几度剑拔弩张，但是，由于大国关系基本稳定，所以局势都转危为安。当然，也正是由于大国之间存在着战略竞争和领土等争端，才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存在隐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也难以缓解。鉴于中俄与美日之间的战略互信缺失，固有的利益矛盾很难消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仍然面临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地区和平仍然表现为“冷和平”，即各方出于现实战略利益考虑尽量避免冲突，而不是以存在战略互信以及集体安全机制为基础的“热和平”。

[参考文献]

- [1]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R/OL]. http://www.jcs.mil/content/files/2011-02/020811084300_2011_NMS_-_08_FEB_2011.pdf.
- [2] 周建明,张曙光. 美国安全解读[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3] 王缉思. 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 [4] 杨春贵. 竞争与安全: 世界大变动中的中国发展战略[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 [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 [7] 梅孜.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Z].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6.
- [8] 傅梦孜. 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 [9]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罗斯·芒罗.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 隋丽君等.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 [10]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R/OL]. 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
- [11] [美]亨利·基辛格. 避免美中冷战[R]. 参考消息, 2011-01-15(8).

(责任编辑 双木)

· 学术信息 ·

《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出版

广东商学院思想理论教学部教授吴琦的专著《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2011年7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首先深入考察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历史演变及其特点、结构与功能，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现代发展；接着考察了国家及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形成和演变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国家安全观；然后围绕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具体分析了意识形态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的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意义；最后论述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维护国家的最大安全，并从安全理念、发展战略与积极防御三个方面重点探索并论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应付之策与自身发展之道。

(卷平冈)